

姜广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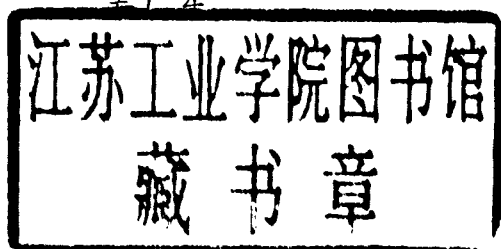
非正式制度、 财产权利与分工扩展

Informal Institution,
Property Right
and Division Expansion

吉林大学出版社
JILIN UNIVERSITY PRESS

非正式制度 财产权利与分工扩展

美 广 在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正式制度财产权利与分工扩展 / 姜广东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5601-3597-7

I. 非… II. 姜… III. 社会分工—研究
IV. F0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4377 号

书 名: 非正式制度、财产权利与分工扩展

编著者: 姜广东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张显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12

字数: 209 千字

ISBN 978-7-5601-3597-7

封面设计: 孙 群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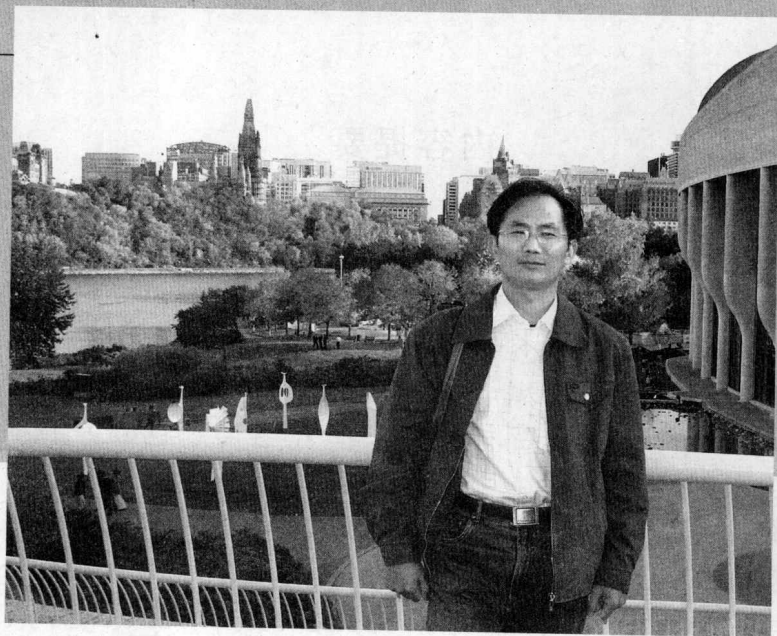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jlup.jlu.edu.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姜广东,男,1964年出生,山东省济宁市人,1985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现任职于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06年获得东北财经大学劳动经济学博士学位。任职期间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经济学教材三部。

个人简介

JIANGGUANGDONG

内容提要

分工扩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分工的扩展受制于两种因素，一是制度知识，二是技术知识，而技术知识的积累最终取决于制度知识的积累。制度知识的积累与一国的文化传统以及主体价值观紧密相关。东亚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是具有特殊主义价值观的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交易中难以相互信任与合作。这样的文化传统使得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的成本大大提高。交易费用过高，分工扩展的余地就会变得相应狭小，它使市场规模的扩大受到限制，同时对企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设置了障碍。因此可以肯定社群主义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市场缺陷。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些国家往往采用强力干预政策，为将来的经济平稳发展留下了隐患，这是东亚各国政府特别是快速发展的国家的政府应该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

本书适用于经济学相关专业的学生、研究人员以及政府决策者作为参考书。

目 录

0 前言	(1)
0.1 问题的源起	(1)
0.1.1 问题的提出	(1)
0.1.2 研究现状	(3)
0.2 研究的目的地方法	(20)
0.3 本文的主要观点及结构	(22)
0.3.1 本文的主要观点	(22)
0.3.2 本文的结构	(25)
0.4 创新与不足之处	(28)
1 分工、市场扩展与经济发展	(31)
1.1 相关增长理论综述	(31)
1.1.1 斯密分工论与杨格定理	(31)
1.1.2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	(39)
1.2 分工演进的负面效应	(46)
1.2.1 人类的异化	(46)
1.2.2 交易成本的提升	(47)
1.3 市场自发扩展的直接条件	(50)
1.3.1 分工结果的内部化	(50)

1.3.2	价格信号的灵活调整	(54)
2	产权与分工和市场扩展	(57)
2.1	产权理论	(57)
2.1.1	产权理论概述	(57)
2.1.2	产权与交易费用	(63)
2.1.3	产权对分工演进的影响	(65)
2.2	产权制度	(69)
2.2.1	产权制度的性质与产权制度的 职能	(69)
2.2.2	有效产权制度的社会条件	(76)
2.3	产权与企业内部分工	(83)
2.3.1	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	(83)
2.3.2	产权与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87)
2.3.3	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	(91)
2.4	产权与社会分工	(94)
2.4.1	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94)
2.4.2	产权分配与社会分工	(98)
3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104)
3.1	制度知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04)
3.1.1	制度知识的含义	(104)
3.1.2	制度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09)
3.2	非正式制度的性质及演进	(115)
3.2.1	非正式制度的性质	(115)
3.2.2	非正式制度的演进特征	(117)

3.2.3	非正式制度演进的影响因素	(123)
3.3	正式制度的性质及其演进	(131)
3.3.1	正式制度的性质	(131)
3.3.2	正式制度知识的积累与路径 依赖	(136)
3.4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区别以及相互 影响	(144)
3.4.1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区别	(144)
3.4.2	相互影响	(150)
4	东亚传统的非正式制度	(157)
4.1	非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	(157)
4.1.1	市民社会的基础——个人主义	(157)
4.1.2	集体主义与经济理性	(162)
4.1.3	儒教、小农经济与集体理性	(165)
4.2	以家为中心的社会结构	(170)
4.2.1	小农经济与以家为中心的社会	(170)
4.2.2	小农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	(176)
4.2.3	家——作为一个生产组织	(179)
5	专制主义的国家政体	(187)
5.1	集体理性与专制主义	(187)
5.2	政治上的专制	(191)
5.2.1	封建社会的终结	(191)
5.2.2	集权社会	(193)
5.2.3	稳定专制统治的基础	(197)

5.2.4	西方国家政治权力的演变	(203)
5.3	经济上的专制	(211)
5.3.1	皇权与产权	(211)
5.3.2	重本抑末	(214)
5.3.3	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	(216)
5.4	近代以降专制主义的演化	(219)
5.4.1	政治上的演化	(219)
5.4.2	经济上的演化	(223)
6	东亚传统非正式制度与不平等的产权关系	(226)
6.1	非个人主义与不平等	(226)
6.1.1	小农经济——一个封闭系统	(226)
6.1.2	家庭内部的治理	(230)
6.1.3	交易中的不平等	(233)
6.2	非个人主义与市场交易	(240)
6.2.1	交易的条件	(240)
6.2.2	非个人主义对产权关系的影响	(243)
6.2.3	社会交易对市场交易的替代	(253)
6.3	非个人主义与企业	(256)
6.3.1	不同交易成本下的合约形式	(256)
6.3.2	非个人主义与企业内部产权关系	(259)
6.3.3	企业一体化与企业分化	(265)
7	非正式制度、政府干预与分工扩展	(269)

7.1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	(269)
7.1.1	发达国家长期增长的基础	(269)
7.1.2	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特征	(278)
7.1.3	日本的例外	(283)
7.2	非个人主义与政府干预	(286)
7.2.1	非个人主义社会政府干预程度	(286)
7.2.2	政府垄断与变异政府垄断	(289)
7.2.3	政府干预与交易成本	(293)
7.3	强政府干预的其他动因	(295)
7.3.1	后发展国家经济加速发展的 条件	(295)
7.3.2	东亚国家的政体	(297)
7.3.3	殖民地经历与赶超战略	(302)
7.4	政府干预与分工扩展	(306)
7.4.1	政府对市场的替代	(306)
7.4.2	韩国的经历	(313)
7.4.3	政府干预的后果	(318)
7.5	国家干预与内生经济增长	(324)
8	结束语	(329)
8.1	文化与东西方的崛起	(329)
8.1.1	基督教文化与资本主义	(329)
8.1.2	儒教与亚洲奇迹	(335)
8.2	东亚奇迹与东亚危机	(341)
8.2.1	东亚奇迹产生的背景	(341)

8.2.2 强政府与东亚危机	(347)
8.3 个人主义与现代化	(355)
8.3.1 个人主义与现代性的统一	(355)
8.3.2 儒教传统文化下的现代化问题	(359)
主要参考文献	(363)
后 记	(373)

0 前言

0.1 问题的源起

0.1.1 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国家成功地走向现代化以后，后发展国家如何效仿西方踏上现代化之路一直成为学者们争论的一个话题，这也是中国面对的一个难题。对于中国来说，这已经是一个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话题，在这期间，国学大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都试图理出一条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但是，直到一百多年后的 20 世纪末期，中国才接近这条道路的边缘。而在这以前，亚洲的许多国家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为什么各个不同的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会拉开如此大的差距？为什么各个国家的道路又如此不同？直到 20 世纪的后半叶，学者们才慢慢地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揭开了谜底。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North）将有效的产权制度看作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

素，并且认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与产权制度密切相关，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轨迹。西方的崛起建立在有效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也将一个国家的非正式制度与市场及经济组织的形成联系在了一起。其实，早在 19 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rx·Weber）就已经开始探索文化传统与资本主义的产生之间的关系了，这里与其说是资本主义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道路。这种道路是以个人主义与理性计算为基础追寻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特征，并且，以资本占有作为剩余索取的依据。韦伯认识到了文化传统与国民财富积累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韦伯毕竟是一位社会学家，他的理论不可能建立在严格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问题固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指标应该是经济指标。所以缺少了经济学的支持，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诠释就显得根基不足。诺斯与福山虽然使用了经济学术语以及一些经济分析方法，理论阐述中不乏洞见之语，但是两人也都不能算是纯正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中缺乏严密的经济学逻辑推理，这使他们的理论缺乏系统性。后来，杨小凯等人继承与发展了斯密（Adam·Smith）的分工理论，使用超边际分析法将产权理论与分工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发展与增长理论。这时的增长论比新古典增长论前进了一大步。杨小凯的整个理论体系将产权理

论、交易费用理论、分工理论等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利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系统解释了国民财富生产与积累。他的理论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但是，杨小凯的理论虽然有严密的经济学推理，但并没有直接地将非正式制度与增长联系起来。也许这是因为此前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将非正式制度与产权界定结合在一起了，已经为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的绩效的解释搭建了一个平台。也许是因为这种解析不符合杨小凯的形式化的研究风格。

本文试图将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非正式制度、财产权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利于更加清晰地把握不同的文化传统及其所造就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同时对既存的有关研究成果作一番梳理与总结。

0.1.2 研究现状

1、分工扩展与经济发展

关于分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的话题，所谓老话题是因为当代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在《国富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分工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地提高，分工经济与自给自足经济是截然不同的，分工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的重要分水岭。所谓新话题

是指分工理论在斯密以后一百多年的时间几乎无人提及，虽然在 20 世纪初经过杨格的发展，但是，依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 20 世纪的 90 年代，在杨小凯的努力下，分工理论重现在学者们的视线里，杨小凯以全新的方法将分工融入了理论分析中。

在斯密的论著中，分工所占的篇幅并不多，但是，分工的地位却十分重要。《国富论》由两大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二是价值与分配理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斯密以后的古典经济学主要沿着后一条线路扩展，而分工理论则被人们所忽视。但是从斯密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分工与增长在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因为书的名称就是《国民财富的原因及其性质的研究》。他已经观察到了分工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被资本主义经济创造的史无前例的生产能力所证实。但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分工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加入到了迂回的生产过程中，人们并不直接生产自己所消费的产品，劳动时间也不再受自己支配，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主角，开始依附于机器。资本家与劳动者产生了巨大收入差距。这些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所不曾出现的问题，都成为经济学家迫切解释的问题，所以，在古典经济学中，收入分配成为一个特别重大的话题。尽管斯密提出了增长理论，但是，古典经济学的主流还是讨论微观经济学的问题。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变化了的仅仅在于研究的方法与基本的分析框架。

在 20 世纪初期，有两个人打破了理论界的平静，为分工理论做出了贡献，一个是杨格（Allyn·Young）；另一位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Durkheim）。杨格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认为不但市场规模决定了分工的程度，而且，分工也影响着市场规模的大小。需求与供给只是分工的两个不同侧面。他还提出了报酬递增的概念，认为递增报酬依赖于分工的扩展，以后阿罗（K·Arrow）等人继续使用了这一概念并把它与“干中学”联系起来。杨格这一时期的分工理论基本上奠定了斯密以后分工理论的新框架，使人相信，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主要依赖于分工扩展的能力，也就是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是否进入良性循环。如果两者之间互动的链条不被打断，分工就可以顺利地循环下去。杨格否认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现象，他认为所谓“规模经济”并不是规模扩大带来的节约现象，而是规模扩大与分工相联系的结果，规模经济实际上是分工的效率体现。涂尔干的分工理论与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有很大不同，因为涂尔干是一个社会学家，他是从社会分化的角度来说明分工的原因的。在《社会劳动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即：“机械关联”与“有机关联”。前者是一种由于彼此相似而形成的关联，当这种形式的关

联主宰社会时，个人之间的差异不大，社会是协调一致的，因为个人之间还没有分化；后者指个人之间不再彼此相似，集体的协调一致表现为一种分化，正是由于“不同”，协调一致才以某种方式得以实现。在他的思想中，“这两种形式的关联是与社会组织的两种极端形式相呼应的”^①，两种极端分别是指氏族社会和现代分工社会。而氏族社会组织形态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人类原始状态，在现代发达的分工社会，氏族组织依然存在。涂尔干将职业分化、工业活动的增多都算作社会分化的表现。他认为社会分化的原因在于：当生存斗争激烈时，社会分化能够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差异，从而避免了激烈竞争所造成的淘汰现象，每个人能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生存下去并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就是说，劳动分工是人类为避免竞争伤害所寻求的一种生存方式。这与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分工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它依然有助于经济学家更好地理解分工的含义。

在 20 世纪末期，以杨小凯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继承与发展了斯密与杨格的分工理论，将杨格的理论形式化，而且将分工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结合起来，创立了新的增长理论，自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

^① [法]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2000 年，第 214 页。